

浅析川陕苏区群团组织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刘 长 江

(四川文理学院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四川 达州 635000)

摘 要: 川陕苏区的群团组织是党领导当地群众参与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活动的重要组织,是密切党群关系、加强党群互动的重要纽带。为巩固苏维埃政权,群团组织动员和组织川陕苏区广大群众,广泛参与了土地革命、戒烟运动、扩充红军以及辅助红军军事斗争等革命活动,向人民大众宣传苏区的各项政纲和决策。这种方式不仅发挥了群众的自主性,也实现了党坚持“群众路线”的目标,对我们今天坚持“群众路线”依然有借鉴作用。

关键词: 川陕苏区; 群团组织; 苏维埃政权; 巩固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29(2015)03-0042-07

一、引 论

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是川陕苏区得以建立、巩固和发展的根本。为“健强苏维埃政权”,1933年6月,川陕省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明确把党的“工作应绝对深入到乡村中去,到群众中去,到群众斗争中去领导群众”“发动全川陕的劳苦群众”写入了斗争纲领。^{[1]17,18}在面临刘湘“六路围攻”的情况下,中共反复强调要“切实加强对工会、反帝拥苏大同盟、互济会、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的领导,在目前战争中,这些组织都要加紧建立自身的群众工作,并动员自己组织里的群众来参加消灭刘湘的一切紧急工作,特别是要抓住目前形势来开展苏区的反帝国主义运动。”^{[1]81}足见,“建立拥有群众基础的工会、贫农团、青年团”等群团组织,正是“形成群众的党,使党成为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的重要方式。^{[2]332}基于此,在川陕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的组织、领导下建立了许多群众性的团体组织,如工会、贫农团、青年团、少年先锋队、童子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后改称女工农妇协会)、反帝拥苏大同盟等。通过各种群团组织,把苏区的穷苦大众团结起来,组成巨大而活跃的革命力量,使人民群众能够有效参与苏区建设和革命斗争。如工会组织不仅使得工人群众在革命活动中有“独立的工作”和“整个的计划”,还能够“切实领导工人群众斗争”,成为苏区革命群众中的中坚力量。^{[2]61}青年团动员和领导了广大劳苦青年群众,积极加入到扩大红军、戒严、肃反、保卫赤区等革命活动中。^{[3]634-635}反帝拥苏大同盟则在苏区群众中间开展拥护苏联的宣传,并动员苏区群众配合、支持红军消灭反动派的斗争。^{[4]391}贫农、妇女和青少年等普通的苏区群众,也在群团组织的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地加入到了苏区各个方面的革命活动当中。

川陕苏区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大苏区,苏维埃政权能在敌人的数次“围攻”下得以巩固,这与其重视建立工会、贫农团、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各种群团组织关系密切。然而,迄今为止,学界鲜有论著论及川陕苏区的群团组织,已有成果大多关注川陕苏区的军事斗争、土地革命等方面。^[5]

收稿日期: 2015-01-20

作者简介: 刘长江(1965—),男,四川渠县人,四川文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川陕苏区史研究。

基金项目: 四川革命老区发展研究中心2014年重点项目《川陕苏区群团组织与建设研究》(课题编号:SLQ2014A-05)。

本文拟就川陕苏区群团组织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略作探讨。

二、群团组织与苏维埃政权的巩固

为巩固苏维埃政权,川陕苏区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各个群团组织广泛参与到了苏区的各项事务当中,如组织群众参与土地革命,推进苏区的戒烟运动,积极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向人民大众宣传苏区的各项政纲和决策等,充分调动各阶层、各年龄段民众的积极性,大力发挥工人、农民、青年、少年、妇女等群众的作用,积极支军参军,支援前线。

(一)群团组织与土地革命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要巩固苏区红色政权,就必须解决广大民众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实行土地革命。据刘瑞龙同志回忆,红四方面军刚到川陕边区时,红军党委多次强调,“积极参加组织和领导广大农民群众的土地斗争”“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基础”。^[6]

据调查,土地革命前,川陕边区土地占有的比例严重不均,如巴中恩阳县的三区一乡四村60户自耕农和贫农,仅占田170挑;而13户地主富农,就占田830多挑。换言之,占总户数10.8%的地主富农就占有全村83%的土地。^[7]缺少土地的农民过着“三月杂粮三月荒,三月野菜三月糠,年年没有过年米,大人娃娃泪汪汪”^{[4]321}的生活。针对这种情况,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后,相继颁布了《关于土地问题的布告》、《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关于土地改革布告》、《怎样分配土地》和《平分土地须知》等法令法规,迅速掀起了川陕苏区土地革命的高潮。根据西北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制定的平分土地办法,各个县都成立了分配土地的组织机构——土地委员会(亦称分田委员会),各村亦成立了分田小组。分田委员会成员有二十至三十人,“但一定要有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协会、少先队”^{[1]518}等群众团体派代表参加。在分田委员会和分田小组里,群团组织代表比例较高,在土地革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贫农团亲自参加平分土地,与当地群众一道“去踩田地山场”,并监督分田委员会的工作。分田之前,群团组织代表先要组织群众“定期召开群众大会来讨论分田”^{[1]518}。分配土地时,“以每家跟着分田的大多数群众意见为主”^{[2]762},坚持“以子粒为标准”即“以田地出产量为标准”“山地和田坝子,酌量分配”。^{[2]1325}各地区按照土地法令和相关政策,先划分阶级,再清查田亩,划分等级。依据地主、富农、中农、贫农的不同阶级身份分得不同的土地,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在对土地肥瘦情况调查清楚的基础上,采取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方法,先把红军(公)田分好提出来,再根据田地、山林、池塘、竹园等的好坏远近情况作一总的计算,并搭配好,最后“按人口与劳动(力)混合划分”,^{[2]762}即人多的或能做庄稼的壮年男女多分,人少的或老弱不能做庄稼的少分。^{[2]1325}划分清楚后,张榜公示分田方案,“征求各家的意见,无人修改作为通过”。然后踩田定界,分发“土地使用证”或“田凭”,并当众烧毁地、富的土地契约。若碰到非常复杂的情况,还要通过群众大会讨论解决,如“万一富农与小地主弄不清,可交群众大会解决之”。^{[2]762}

不过,因为很多地主富农在划分阶级和“查田”过程中“故意捣乱”,通过请酒或用金钱收买的方式破坏划分阶级和分田的客观公正性,要么混入中农,要么并不真的把田分给贫农。因此,苏区党和苏维埃政府一再强调要“着重的领导乡村中雇工和苦力工会,领导贫农团来深入查田运动”。^{[2]228}因为群团组织的会员均系当地群众,谁是地主、富农,谁是中农、贫农,都十分清楚,并且通过团体力量的监督,也使个别的群众不会被地主和富农的金钱所收买诱惑,从而有效地防止了地主富农对土地革命的“捣乱”,使贫农、雇农和中农切实享受到土地革命的成果,以巩固苏维埃政权。因此,群团组织在分田委员会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7]此外,群团组织还可以监督苏维埃政府在土地革命当中的活动。“对各级苏维埃政府,工会有检查和监督的权利”。工会监督苏维埃政府的内容,就具体包括“如不分田给雇农、贫农和红军、游击队的”“工会有权揭露,召开群众大会罢免”。^{[8]191}

可见,在土地革命中群团组织处在一个很重要的“中间”角色:既防止地主富农等对土地革命或明或暗的破坏,又监督苏维埃政府是否切实为贫农、雇农分田。正是群团组织的参与,才使得在土地革命中能够真正的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贫农和雇农。这从根本上满足了广大农民梦寐以求的土地愿

望,极大地调动了群众的革命热情,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保田保家,参军参战,努力支援前线”,仅在苏区的达县地区就有70000人参加红军。^{[9]79}

(二) 群团组织与戒烟运动

红军入川前,川北地区鸦片烟是普种、普售、普吸的,而国民党军阀为抽重税,还逼迫广大民众用最好的田种植鸦片,如通江、南江、巴中地区的鸦片种植面积约占土地面积的30%—40%,上等的良田成为了烟毒的产地,真可谓“纵目田畴,已成黑化”^{[10]12}。仅宣汉一县,年产鸦片就达7万担以上。该县南坝区所产的鸦片更是被“誉”为“川东美芙蓉”。不仅如此,当地军阀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还强迫百姓吸食鸦片,不吸就要缴纳“禁烟捐”。^[11]因此,川北地区男女老少几乎都染上了烟毒。如南江“烟民”中“男的占三分之二强,女的占三分之一左右,连放牛娃娃都烧烟,挨家挨户都吸”^{[4]558}。江口(今平昌)得胜场,130户450余人,不会吸毒者仅有6人。巴中化成一个区,有瘾民5765人,占成年人口70%以上。军阀刘湘、杨森、田颂尧等部队是有名的“双枪军”(指身背步枪,怀揣烟枪),从长官到士兵个个都是烟鬼。^{[4]555-558}穷人吸烟后倾家荡产,卖儿卖女,许多人无饭吃,甚至大批饿死,如巴中梁永天平寨傅家院子住有20户60余人,其中有18户25人因吸毒卖掉家产,逃往通江,最后饿死在苦草坝,成了绝户。^{[12]263-264}巴中化成区因吸毒而倾家荡产的119户,其中卖儿卖女43户,卖妻24人,逼为盗匪的27家,流落到他乡死去的21人。^{[12]268}此足见烟毒对当地百姓危害之剧。

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进入川北,了解到该地烟毒危害甚剧的情况后,当时的川陕省委、省苏维埃政府认为:“只有禁绝鸦片,才能增强人民体质,改变人们的精神面貌,多打粮食,发展苏区经济。支援革命战争,改善人民生活,使革命根据地不断地得到巩固和发展。”为此,召开了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禁烟事项。^{[4]555-558}规定“吸烟者得分期禁断”,“惟年老气衰,不能禁戒者于乡区苏维埃许可之下,得减食鸦片”。^{[2]1425}在省和县苏维埃政府内都成立了戒烟局,“规定戒烟办法,研究戒烟药品”,并组织宣传队,大力开展戒烟运动。^{[4]558}

群团组织在川陕苏区的戒烟运动中十分活跃。他们大力宣传鸦片的危害,组织群众到戒烟局戒烟,并且没收土豪劣绅的烟进行烧毁。工会有一项明确的权利,就是检查监督各级苏维埃是否“烧鸦片”。前已述及,川北地区无论男女老少、穷人富人,都吸食鸦片,时人戏称“川北连老鼠都想抽大烟”,因此各地苏维埃吸收的本地穷苦工农中难免有吸食鸦片者。工会对各级苏维埃的检查监督不仅是在政权内部排除烟毒,也为在群众中开展禁烟运动起到了表率作用。^{[8]191}为进一步推动和指导戒烟运动,陈昌浩号召发动群众监督戒烟,“最好组织下层之青年或童子团的戒烟队”^{[2]841}。在组织群众戒烟方面,妇女组织的表现尤其突出。在妇女部和女工农妇协会的组织带领下,大多数的妇女都加入到了戒烟运动当中,她们“最拥护戒烟的号召,是戒烟运动的积极分子”^{[8]194}。她们不但“劝告自己的丈夫、父母不要吃烟,不种烟,不卖烟”^{[4]561},还自动组织起来监督吸食鸦片的丈夫和父母。如通江县鹦哥嘴农妇李开英,就带头把抽大烟的丈夫送进了红军的戒烟所,经过三个月的戒烟治疗后,她的丈夫不仅戒绝了烟瘾,还参加了红军。^[13]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也说:让我们始料所不及的是,“妇女成了戒烟的急先锋”。在通江戒烟所第一期300余人的戒烟人员中,“不少是由他们的母亲或妻子送来的”。更为可喜的是,在通江县召开的一次妇女戒烟群众大会上,竟有5000多名妇女参加。^{[14]165}

为帮助部分新兵戒烟,红四方面军还成立了戒烟连,负责新兵的戒烟工作。李定灼将军在其回忆录中,曾十分生动地记述了他是如何把一连“烟灰兵”变成体魄强壮、勇敢善战的红军战士的故事。^{[15]374-380}徐向前元帅亦曾回忆说:“戒烟一事,成效可观。快则一个星期,慢则个把月,绝大多数患者即戒绝了抽鸦片的恶习。”“这项工作,对增强部队体质,完成作训任务,密切军民关系,保持人民军队的阶级本色,起了重要作用。”^{[8]220}张国焘也说,经过一年的努力,通南巴一带吸烟的人大大减少,没有完全戒绝的约占20%,仍然吸烟的老弱不过10%而已,不吸烟的人占70%以上。^{[14]164-166}

由上可见,川陕苏区禁烟效果颇为显著。三年中,“巴中总共烧毁了九千到一万多斤,通江烧了七千多斤,南江烧了五千多斤”^{[4]559}。川陕苏区境内基本上革除了吸烟这一社会毒瘤。据《川北穷人》第九期(1933年2月)报道称:“连日来戒烟的将及百余人,两星期内已有五十余(人)完全戒脱。四年者即需一月,毫无痛苦。”^{[2]1470}通过戒烟,不仅增强了苏区人民的体质,也为红军捍卫苏维埃政权提供了体

魄强壮的兵源。

(三) 群团组织与扩红运动

红四方面军入川后不断遭到四川军阀的围攻,战争形势非常严峻。为补充兵源,捍卫苏维埃政权,苏区党号召川陕全党必须转变苏维埃的工作,“深入到群众中去,动员和组织川陕千万群众,扩大五万红军主力”“用一切力量来保卫川陕赤区,彻底消灭刘湘”。^{[1]65}如何转变苏维埃的工作才能完成“扩大五万红军主力”这一艰巨任务呢?群团组织无疑是这一工作“转变”中的关键,即党加强对群团组织的领导,重视工会、贫农团等群团组织的工作,由群团组织来执行党的一些决议,通过群团组织来提高雇工贫农的积极性,领导群众参与革命活动。^{[1]33-34}群团组织是比红军宣传队规模更加壮大的宣传力量,承担着广泛的宣传任务。动员苏区群众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是群团组织一项长期的宣传任务。苏维埃坚决反对像国民党一样“拉”、“抽”、“派”,要通过宣传动员,使“群众自愿参加”。

群众大会是群体组织宣传和动员群众的重要场所。在群众会议或个别谈话时,群团组织“普遍鼓动”广大群众参加红军,向群众“宣传优待条例,有计划的召集红军家属联欢会,杀猪、称盐、发旧衣服拥护红军家属,实行代耕。”^{[2]170}通过宣传和落实对红军家属的优待,以提高群众参加红军的热情。每个团员都要“动员群众,老劝幼,弟劝兄,兄劝弟,妻劝夫,来参加红军,参加地方武装,当运输队,当担架队、赤卫军、少先队、游击队、袭击队等,来配合红军行动”^{[2]1021}。群团组织四处奔走,通过“每乡每村开会向群众解释”“宣传群众自愿参加”,^{[1]96}以此来扩充红军和地方武装。群团组织在大会上的宣传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如赤江城区四乡通过召集全乡的群众大会动员后,有一位吴华全老汉就主动将自己的儿子送到苏维埃参加红军。他说:“我一个儿子送来参加红军,才能保障土地利益。”在“长赤一区一乡,亦是一位老同志亲自送自己的儿子参加红军。”^{[2]1570}有时一次群众大会就能吸收二十多名符合条件的工农群众参加红军。^{[2]1535}如红军在贵福召开群众动员大会后,许多青年农民踊跃报名参军,“贵福区三天就组成了一个独立营”^{[16]78}。

在宣传动员中,工会主要动员“积极工人参加红军”“动员全体工人,组织并加入赤卫军、少先队、童子团”。^{[2]62}贫农团“动员广大贫农参加红军”,号召“贫农中的男女青壮年参军参战”,“贫农中的少年儿童参加少先队、童子团”。^{[4]362}青年团主要是“动员广大劳苦青年自动武装起来,消灭刘湘军阀的新进攻;加紧扩大红军,戒严、肃反、保卫赤区”^{[3]634-635}。女工农妇协会为红军的扩军做宣传,主要是劝说自己的丈夫、儿女参军。工会、贫农团、女工农妇协会等都多次召开会议,“进行热烈的鼓动,号召群众起来保卫赤区,参加赤少队”^{[1]127}。

除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之外,群团组织还通过戏剧表演、歌曲传唱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如1933年9月成立的川陕省工农剧团(又叫蓝衫剧团、新剧团)编演的《送郎当红军》、《劝郎回头》、《十劝夫》、《扩红谣》等节目,深受群众喜爱。当时所传唱的一些歌曲,在动员群众参加红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穷人参军为革命,红军打仗为穷人。”^{[2]1682}“红军都是工农起,受了豪绅多少欺,垄断我政治,剥削我经济,一年到头痛苦无比。解除痛苦只有来革命,快来团结向前进,团体要结紧,阶级要认清,杀尽敌人工农专政。”^{[2]1707}红军西征到四川,“款子免除田来分,穷人踊跃入红军。自己为的是自己,莫让敌人再翻身”^{[3]709}。通过动员,苏区群众不仅把红军引为贴心人,还直接参加红军。正如一些歌谣所唱:“红军叔叔要起身,我要跟着当红军。不放牛来不放羊,挎上一把盒子枪,碰见穷人喊同志,碰见敌人就开枪。”^{[2]1693}“一送我郎当红军,郎当红军救穷人。打垮土豪和恶棍,好让穷人来翻身。……三送我郎当红军,郎当红军杀敌人,活捉刘湘蒋介石,单刀两刀处死刑。”^{[2]1763}甚至有的群众“听说华阳来红军,躺在床上睡不稳;穿上衣,起了身,半夜三更寻红军。盼红军,想红军,脚板走烂找红军;不怕岩陡林又深,不当红军不死心”^{[17]73}。

群团组织不仅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也积极参加到红军和地方武装中,为扩充红军起到表率作用。工会、贫农团、共青团员等都要选送先进的会员参加红军,其中,共青团的表现尤其突出。如红江县“有九名团员认清本身任务,一致自动起来热烈的参加红军”。南江县在1934年“二月二十号到三十号十天内,有团员去参加红军的二十二名,到三十一军中去了,热烈的到前线去消灭敌人”。^{[2]1611}共青团负有“动员和领导扩大红军和扩大少先师的工作”的责任,“不但是去发动,而且要领导好的少先队员、青年

团员到红军中与少先师中去”。^{[3]641} 团员还要“亲身去领导少先队到前线去配合红军行动,参加红军”。^{[2]1022} 1934年2月5日,《少年先锋》第30期报道称:“赤江四区杨国祥同志是个团员,负责担负起团员的任务,为消灭刘湘保卫赤区,他一个人鼓动了二十一个穷苦青年群众与他本人一起热烈的参加红军去了。”^{[2]1586}

通过宣传动员,尤其是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后,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各地群众“热烈”地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如“南部碑院寺一带,工农穷人革命热情非常高涨,最近(1933年10月)每天都有几十个人参加红军”^{[2]1534}。1933年12月份的数据显示,广大群众“风起云涌”地参加红军,最近十天内,“仪陇扩大红军四百六十人,阆南扩大红军五百七十三人,苍溪扩大红军四百七十四人,恩阳扩大红军二百多人。”^{[2]1563} 1935年2月16日,苏区机关报《干部必读》第101期报道称:“汉中、沔县、上元关、宁羌、阳平关一带群众斗争高涨无比……一天有几百人参加红军。”^{[2]1638} 无论从扩军速度还是参军数量上看,群团组织的扩红宣传都是非常成功的。

(四) 群团组织与军事辅助工作

如前所述,在川陕苏区,“保田保家,参军参战,努力支援前线”已成为群众性的口号。群团组织除了宣传动员群众参加红军和地方武装外,还要积极组织不能参军参战的妇女、儿童等加入到各项军事辅助工作当中,从各方面去支援战争,保卫苏维埃政权。

工会在加紧军事训练的同时,也“站岗放哨以及戒严、肃反工作,帮助苏维埃收缴地方反动的枪支、刀矛、梭标、土炮、鸟枪来武装工人,帮助工人学习打枪、上操”,时刻准备和敌人作战。^{[3]590-591} 共青团“对童子团、少先队起很大的领导作用,加紧站岗放哨,捉拿敌人侦探、坐探,不让敌人一个侦探混进赤区一步。”^{[2]1612} 童子团的主要工作任务是站岗放哨、送信、慰劳红军家属,并且装备有“矛子、花木枪、铁刀、木刀、木棒”等武器来“打反动,捉侦探”。^{[4]379} 童子团站岗放哨时非常认真、尽职尽责,每五、六里设一岗棚进行戒严,盘查出入人员,“恐防反动派,乘机混入境”^{[2]1084}。据《少年先锋》报道,“阆南县一区一乡四村的儿童蔡金娃等,那天站岗遇见少先队队员一人从此过去,没有路票,当时被蔡金娃挡着说:‘你若是县委的都要有路票才才行……’这四个小同志扛了一支矛子,三根木棍,送他到县委来看到底是真的假的。”^{[2]1551} “赤江县凤凰观一村有八岁童子团站岗非常尽责。达县县苏主席到村苏工作,没有路票不准他通过;政治部同志拿钱给他,他都不要,一定要往村上拉。”“花溪六区一乡的童子团站岗放哨,有区苏一童子私逃,被童子团英勇拿获。”^{[2]1607} 毛浴镇和巴中市的模范童子团,“约500余人,他们的组织象军队一样,并且有大量的武器,能单独的行动,(能)打反动和参加地方肃反等工作的活动”^{[4]379}。1934年1月26日,赤江二区童子团“在本城内活捉两个国民党的办案委员,一个在洪花溪住,一个在猫儿垭藏躲。他还想混入我们赤区来破坏造谣,就被我们勇敢的童子团捉住了。”^{[2]1586} “万源县竹峪关五乡的童子团,活捉了王三春的侦探四人,又活捉了甲长一名,团正一名。这竹峪关的万源县城区的童子团一个队长,他把刘湘的侦探捉住了。清江渡模范区的童子团打野操,在石崖里活捉了两个甲长。”^{[2]1587} 花溪六区四乡的童子团“活捉刘湘派来侦探一人”,“花溪童子团每天都要捉拿反动一、二人。当这几天捉了国民党员二名,改组派一人,造谣破坏共有二人。这就是一般青年小同志的热烈肃反。”^{[2]1607}

战争时期,群团组织充分宣传和动员了广大农村妇女、贫雇农、各行业工人、儿童、青年等各个层面的群众,承担了苏区主要的交通运输任务,为红四方面军的后勤保障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有力地保障了红军前线作战所需物资,使得川陕苏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能够生存下来并进而发展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在1934年10月前后三个月的时间里,广大农村妇女就做了30多万双布鞋、草鞋、袜套等送给前线红军,积极配合红军粉碎“川陕会剿”。^{[18]222} 尤其是在男人大多上前线作战的情况下,女工农妇协会承担了运粮、送弹药和抬伤病员等重要工作。川陕苏区大部分地方都是山路,女工农妇协会就组织妇女用人力背着运过去,用背夹子、打杆子背;遇到一些沟河,就组织妇女搭桥来保证运输。缺麻袋,她们就用裤子装粮,扎住两个裤脚,再缠住裤腰,骑在脖子上背。她们不仅白天要加紧运粮,晚上还要点起火把运输。部队打到哪里,她们就把弹药和炮弹箱子运送到哪里去。从战场上回来的时候,还要负责把伤兵和战利品抬回来。^{[19]220} 工会和青年团也组织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青年参加担架队、运输队,“运输军

需,救护伤亡”,保证了苏区的运输通畅,协助救护伤员。^{[3]607}

此外,群团组织还积极带领群众参与到苏区的肃反运动中,防止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与颠覆活动,以巩固苏维埃政权。对此,笔者拟另文讨论,此不赘。

三、结语

综上所述,川陕苏区群团组织是一股非常活跃的群众力量,其活动涉及苏区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在巩固川陕苏区政权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群团组织宣传、动员了大批群众参加红军、游击队、赤卫队等,壮大了苏区的武装力量,尤其是群团组织的会员直接加入到红军和地方武装当中,也大大增强了苏区的军事力量。如1933年12月,在六天内,“苍溪五六两区扩大赤卫军两团,恩阳成立了独立第6团”,阆南完成了扩大工人师一连人的任务,共计一百四十名,“苍溪扩大的工人师也有五十多人”。^{[2]1563}能取得如此优异的扩军成绩,群团组织在其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党的“群众路线”下,群团组织是党和苏维埃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组织,通过群团组织可以更广泛地发动群众支持苏维埃政府,参加革命斗争,扩大群众基础;工农群众也可以通过群团组织,积极参与苏区各项事务,尤其是在平分土地、禁烟运动和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群团组织来加强党对群众的领导、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不仅发挥了群众的自主性,也实现了党坚持“群众路线”的目标,这种方式对我们今天坚持“群众路线”依然有借鉴作用。

【参 考 文 献】

- [1]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上)[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
- [2]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川陕革命根据地博物馆编.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资料集成[G].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 [3] 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文献选编(下)[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 [4] 林超.川陕革命根据地历史长编[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
- [5] 苏建坤,李敏.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综述[J].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2,(6).
- [6] 刘瑞龙.我在川陕苏区和红四方面军的活动[J].四川党史研究资料,1983,(2).
- [7] 温贤美,永向前.川陕苏区的土地革命[J].社会科学研究,1979,(3).
- [8] 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7.
- [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2辑)[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10]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21辑)[G].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 [11] 罗其芳.川陕苏区土地革命述评[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4,(7).
- [12] 王超,张铮.巴中现代革命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
- [13] 阮凌曦.罂粟花败血花红——红四方面军川北禁烟纪实[J].党史纵览,1996,(5).
- [14] 张国焘.我的回忆(3)[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 [15] 艰苦的历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革命回忆录选辑[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 [16] 川陕革命根据地渠县苏维埃资料选编[G].内部资料,1988.
- [17] 柳菁.汉中民间歌谣集成(上)[G].内部资料,1989.
- [18] 林超.川陕革命根据地史[M].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 [19] 唐敦教等.川陕革命根据地斗争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On Mass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gime Consolidation of Soviet Power in Sichuan – Shaanxi Soviet Area

Liu Changjiang

(Sichuan Old Revolutionary Area Development Study Center ,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 Dazhou Sichuan 635000 , China)

Abstract: The mass organiz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ha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directs the peop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Soviet power and revolutions , so it becomes a vital link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people. To consolidate the Soviet power , the mass organizations call the people together in Sichuan – Shaanxi Soviet Area to take part in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 Campaigns against Opium , the enlargement of Red Army and the military fights , and especially , to publicize the Party's policies. The method encourages the mass's subjectivity , reaches to the aim of following the mass lines , which is still significant today.

Keywords: Sichuan – Shaanxi Soviet Area; mass organization; the Soviet Power; consolidation

[责任编辑: 刘 力]